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337-344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10762

Hans汉斯

代际关系变迁视角下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功能重塑

罗　璐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6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6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7日

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与家庭结构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照护资源弱化、代际分居常态化以及养老需求多元化等现实挑战。养老服务设施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其社会功能和空间意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代际团结理论以及双元孝道模型，从代际关系变迁视角出发，探讨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功能重塑的社会逻辑。研究发现：在传统孝道伦理影响下，养老服务设施长期被视为家庭责任缺失和代际关系断裂的象征空间；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流动加速以及孝道观念由“权威性孝道”向“相互性孝道”转变，养老服务设施逐渐摆脱传统的负向空间表征，并由单纯的生活照护空间转变为维系家庭联系、促进代际互动和实现情感补偿的重要空间载体。进一步分析表明，现代养老服务设施通过提供专业照护服务、创造代际共享场景以及构建社区融合平台，正在成为连接家庭、社区与社会的重要“情感联结站”。因此，未来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应超越“床位供给”逻辑，转向“关系供给”导向，通过构建代际友好型空间促进家庭团结与积极老龄化目标实现。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养老服务设施，代际关系，空间生产，情感联结

Spatial Function Reshaping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Transition

Lu Lu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26, 2026; accepted: October 1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7, 2026

文章引用: 罗璐. 代际关系变迁视角下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功能重塑[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337-344.
DOI: 10.12677/ar.2026.1310762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s, the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elderly care model is increasingly challenged by weakened caregiving capacity, the normaliz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residential separation,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older adults' care needs. As an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 for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eing,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in both their social functions and spatial meanings. Drawing on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ory, and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ocial logic underlying the spatial function reshaping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filial ethics,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were long perceived as symbolic spaces representing the failure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up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ties. However, with the miniaturiz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s, increasing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lial piety from centralized governance to reciprocal forms, these facilities are gradually shedding their traditional negative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Their functions have evolved from simple care-oriented spaces into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maintaining family connections, promoting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nd providing emotional support. Furthermore, modern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vital "emotional connection hubs" by offering professional care services, creating shared intergenerational spaces, and fostering community integration. Therefore, futur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should move beyond a bed-supply-oriented approach toward a relationship-support-oriented paradigm. By constructing intergenerationally friendly spaces, such facilities can strengthen family solidarity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active ageing.

Keywords

Active Aging,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Spatial Production, Emotional Bond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截至 2025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32,338 万人[1]，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此同时，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以及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家庭照护资源减少、空巢老人数量增加以及养老需求多元化趋势，使养老服务设施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以及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不断完善。然而，在社会认知层面，养老服务设施仍然面临一定程度的文化困境。传统观念中，养老机构往往被视为家庭责任缺失的象征，入住养老机构容易被理解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表现。这种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养老服务设施的发展与社会接受度。

事实上，养老服务设施不仅是提供养老服务的物理空间，更是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运行的重要场域。随着代际关系模式发生变化，养老服务设施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空间意义也在不断调整。从传统意义上

的生活照护场所，到现代社会中的家庭联系平台、社区融合空间和情感支持空间，养老服务设施正在经历深刻的功能转型。因此，有必要从代际关系变迁视角重新审视养老服务设施的发展逻辑，探讨其空间功能重塑的内在机制及现实路径。

1.2. 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养老服务设施的物理空间被赋予了哪些新的社会功能与象征意义？其内部的空间逻辑、使用者的互动方式以及外部的社会评价，是如何被代际互惠模式、孝道观念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变迁所重新定义的？最终，积极的规划应如何响应这种重塑，创造出能够承载并再生产和谐代际关系的空间环境？

从理论层面来看，现有养老服务设施研究主要集中于设施供给、空间布局和运营管理，对于养老设施空间功能形成机制及社会关系基础关注不足。本文将代际关系变迁引入养老服务设施研究领域，有助于丰富养老设施研究的社会学解释视角。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已经成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研究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功能重塑的规律，有助于推动养老设施规划建设由单纯供给导向向关系支持导向转变，为构建代际友好型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文献综述

2.1.1.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已成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共同焦点。围绕这一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空间配置与均等性、设施可达性与优化决策、空间环境适老化设计以及宏观治理策略等维度展开。

在空间配置与均等性方面，王鹏等以苏州市为例，发现设施空间配给与城镇空间结构高度相关，城乡不均等主要源于乡村地区内部配给的不均衡，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失配使乡村老年人均设施配给量偏低[2]。陈锦垚等基于西安市多源数据的分析同样表明，设施在传统城区集中分布，城乡过渡区可达性较低，整体呈现不平衡的分布格局[3]。在空间环境设计方面，周燕珉和冯潇逸通过对养老设施的实地调研，总结了四类重要室外空间(集体活动广场、楼前活动场地、代际交流活动场地、认知症花园)的适老化设计要点。值得关注的是，该研究将“代际交流活动场地”列为养老设施的核心空间之一，这为本研究探讨养老设施承载代际互动功能提供了来自设计实践的直接支撑[4]。在宏观治理层面，胡湛和彭希哲提出，中国老龄社会的治理应从碎片化管理转向整体性治理，从聚焦老年人口转向全生命周期关怀，强调“以制度变革适应人口”[5]。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在空间优化、环境设计和治理理念方面取得丰富成果，但多将养老设施视为功能性的物理空间，相对忽视其作为承载家庭情感与代际关系互动的社会空间属性。这一理论缺口为本研究提供了切入空间。

2.1.2. 代际关系变迁研究

代际关系一直是家庭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西方学界较早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中Bengtson提出的代际团结理论认为，家庭代际关系主要通过情感团结、结构团结、功能团结、规范团结、共识团结和交往团结六个维度得以维系[6]。该理论突破了传统代际支持研究仅关注经济交换的局限，强调情感联系和互动频率对于家庭关系稳定的重要作用。

中国学者对于代际关系的研究则更多立足于本土文化背景。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揭示了中国

家庭代际支持的运行逻辑，即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投入并非终点，而是在其晚年阶段通过子女反向支持实现代际循环[7]。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反馈模式构成了“养儿防老”观念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家庭结构转型，传统代际关系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研究提出的双元孝道模型指出，当代孝道可以区分为“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两种类型。前者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和责任履行，后者则强调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相互关怀与平等互动[8] [9]。研究发现，相互性孝道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特征。

与此同时，核心家庭化、人口流动加速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使传统家庭照护能力不断弱化。在此背景下，家庭养老逐渐由单纯的家庭责任转变为家庭、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合作过程，养老服务设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代际关系研究更多讨论家庭支持模式、孝道观念变迁及养老责任分担问题，对于养老服务设施这一具体空间载体关注不足。

事实上，养老服务设施并非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家庭代际关系实践的重要场域。随着代际关系由“权威–服从”向“平等–互惠”转变，养老设施所承载的社会意义、情感功能和空间价值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有必要将养老服务设施置于代际关系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揭示养老设施空间功能重塑的内在逻辑。

2.2. 理论基础

2.2.1. 空间生产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并非中立、客观和静态存在的容器，而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空间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社会关系[10]。从这一视角出发，养老服务设施不仅是提供养老服务的建筑实体，更是代际关系、养老观念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社会空间。其空间功能不仅体现在生活照护层面，也体现在情感交流、身份认同和代际互动等社会层面。因此，养老设施空间功能的变化本质上是社会关系变化在空间领域的具体体现。

2.2.2. 代际团结理论

代际团结理论强调家庭关系的稳定依赖于情感联系、资源交换和互动频率等多个维度。该理论指出，良好的代际关系并不意味着长期共居，而在于持续的情感交流和功能支持[6]。对于养老服务设施而言，其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专业照护，更在于能否促进代际互动、维系家庭联系和增强情感支持。因此，养老设施应被视为促进代际团结的重要社会空间，而非家庭责任缺失的象征。

2.2.3. 双元孝道模型

双元孝道模型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孝道实践已经由传统权威性孝道逐渐转向相互性孝道。子女履行孝道的方式不再局限于共同居住和日常照料，而更多体现为尊重父母意愿、保障其生活品质以及满足其情感需求[8]。这一变化使养老服务设施逐渐获得社会认可。入住养老机构不再被简单理解为“送养”，而被视为保障老年人获得专业服务和高质量生活的重要方式。养老设施由此成为现代家庭实践新型孝道的重要空间载体。

3. 传统叙事：养老设施作为“代际断裂”的象征空间

3.1. 传统孝道伦理下的家庭养老逻辑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养老模式建立在家庭养老基础之上。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指出，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投入将在其晚年阶段通过子女的赡养行为得到回馈[7]。这种代际交换关系不仅构成传统家庭

运行的重要逻辑，也塑造了中国社会对养老责任归属的基本认知。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养老单位。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主要依赖家庭内部完成。尤其是在儒家孝道文化影响下，“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等观念深入人心，家庭养老不仅是一种现实选择，更是一种道德要求和社会规范。共同居住成为家庭养老的重要空间表现形式，子女与父母之间通过长期共居实现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养老服务设施长期被置于家庭养老的对立面。入住养老机构往往被视为家庭责任缺失的结果，甚至被赋予“不孝”的负面评价。养老设施因此不仅是一种养老服务场所，更承载着复杂的文化象征意义。

3.2. 养老设施的空间隐喻与道德标签

由于家庭养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养老服务设施在社会认知中形成了明显的负向空间表征。对于许多老年人而言，养老院意味着离开家庭、脱离熟悉的社会网络以及传统家庭角色的终结。因此，养老机构常被视为家庭关系断裂的象征空间。从空间生产理论角度来看，这种负向表征并非来源于养老设施本身，而是由特定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共同建构而成。养老机构的围墙、门禁以及封闭管理模式在客观上强化了社会公众对于其“隔离空间”的认知，使其成为区别于家庭生活空间的特殊场所。

部分研究发现，不少老年人将养老院视为“最后归宿”或“等待终点的地方”。这种认知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于养老机构的负向空间想象，即认为入住养老机构意味着家庭支持功能失效，老年人被迫脱离正常社会生活。由此，养老设施被赋予了消极的象征意义。

3.3. 代际双方的空间困境

在传统养老观念影响下，养老设施空间中的代际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矛盾状态。对于老年人而言，入住养老机构往往意味着失去熟悉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许多老年人即使存在照护需求，也会因担心被视为“被遗弃”而排斥机构养老。他们往往倾向于继续留在家庭环境中，即便面临生活不便和照护不足的问题。对于子女而言，选择养老机构同样面临较大的道德压力。虽然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加以及异地就业现象普遍存在，但不少子女仍然担心因送父母入住养老机构而遭受外界负面评价。因此，在现实中经常出现“需要机构养老却不愿选择机构养老”的现象。

这种代际双方共同面临的心理压力，使养老设施长期处于社会认可度不足的发展困境之中，也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需要突破的重要文化障碍。

4. 代际关系变迁与养老空间需求重构

4.1. 从“权威－服从”到“平等－互惠”：代际关系的性质之变

驱动养老设施空间功能重塑的根本力量，来自当代家庭代际关系本身的结构性转型。随着教育的普及、个体意识的崛起和市场经济对个人能力的推崇，父辈基于资源控制的绝对权威大幅消解。叶光辉等人的研究表明，当代孝道的核心已经从强调子女的单向服从与牺牲的“权威性孝道”，转向强调亲子间相互理解、情感沟通与平等回馈的“相互性孝道”这种转变使得养老选择不再是父辈自上而下的指令或子辈被动的道德义务，而日益成为一个需要代际双方协商、权衡情感与资源的互动过程，从而为养老设施的“正名”提供了可能[8]。

4.2. “分而不离”的理想：“照料－自主”的张力催生新空间需求

马春华等学者对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研究发现，核心家庭已成为主导形态，但与此同时，代际间的互助网络并未解体，而是形成了一种“分而不离”的空间新模式：亲子就近居住，以便保持频繁的互访

和照料，同时又各自保留生活自主权。这种“照料–自主”的持续张力，正是催生现代养老设施新需求的关键[11]。子女可以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关怀，但无法全天候替代专业护理，也不愿因长周期的身体照料而将亲子关系彻底工具化为“护工–患者”关系。而老年人同样渴望在获得必要照护的同时，避免陷入对子女的彻底依赖，以维系最后的尊严与自主。一个专业的、有品质的养老设施，恰好能同时满足这种“照料的获得”与“自主的保全”的双重期待。

4.3. 消费社会的赋能：选择养老设施成为新型“情感劳动”

消费社会的到来，为上述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与文化赋能。霍克希尔德提出的“情感劳动”概念，在家庭领域同样适用，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正在更新[12]。当子女无法通过长久的身体陪伴来践行孝道时，精心比较、筛选并付费购买一家服务优良、环境体面的养老社区，就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补偿性情感表达。它向父母、向亲友、也向子女自身证明：这并非抛弃，而是一种“为孩子未来着想”的理性与爱的双重实践。养老设施的市场，因此成为代际情感选择和展演的新领域，其空间的品质、声誉和象征意义，开始承载以往由“家”所承载的道德重负。

5. 功能重塑：养老设施作为“代际联结”的积极空间

5.1. 孝道的空间转译：从床前尽孝到为父母“购买一个家”

传统孝道要求在空间上“床前尽孝”，而现代家庭养老实践则将这种责任伦理转译为对父母生活品质的系统性安排。子女为父母选择一个拥有明亮的私人居室、可口的餐饮、丰富的文娱活动和专业健康管理的养老社区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父母购买一种体面、安全且有社交归属感的生活方式。杨善华等的研究指出，当代城市家庭养老正从“身体在场照料”转向以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为主的责任伦理模式，这为理解养老设施消费行为提供了观念层面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养老设施的空间本身成为了子女书写新型孝道叙事的文本[13]。

5.2. 角色的物理缓冲带：化解面对面照料中的代际摩擦与情感耗竭

现代家庭照料的深层困境，往往并非爱的匮乏，而恰恰是由于过度、高强度的面对面照料，导致了代际间难以避免的摩擦与“亲职倦怠”。沈奕斐在对城市个体家庭的考察中指出，当子女或儿媳不分昼夜地承担起翻身、喂饭、处理秽物等基础照护任务时，亲子间的伦理关系很容易被磨损为纯粹的体力和情绪负担，温情被消耗殆尽[14]。而一个专业照护机构的介入，则相当于在代际间设置了一条恰如其分的“物理缓冲带”。它将繁重的、技术性的照护工作分离出去，由专业人员完成，从而使子女得以从“护工”角色中解脱，回归到“情感陪伴者”的本位。空间上的适度分离，反而净化了代际关系，提升了每次见面的质量，使其成为真正愉悦的“探访”而非无奈的“执勤”。

5.3. 情感的双向补偿：仪式感空间与超越“保管”的“陪伴”设计

在此基础上，养老设施空间还承担起代际间情感双向补偿的功能。一方面，许多养老机构通过精心设计的公共餐厅、花园露台和多功能厅，定期举办节日庆典、生日派对和跨代联欢等活动，用空间的仪式感创造出代际共享的正面记忆。这不再只是对老人身体的“保管”，而是对他们生活意义的持续激发。另一方面，优良的设计也充分关照子女的参与，为他们提供与父母共同下厨、饮茶、散步或只是安静共处的舒适空间。当子女发现自己在养老院不是尴尬的闯入者，而是受欢迎的陪伴者时，他们为父母“购买”这个空间所获得的道德满足感才能最终实现。如此一来，养老设施超越了物理属性，成为了联结而非隔离、滋养而非消耗情感的真正的“情感联结站”。

5.4. 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功能重塑的现实实践：日本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

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地域包括照护体系”强调老年人在熟悉社区中实现原居安老，养老服务设施广泛嵌入社区，与商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协同布局。许多养老机构在一楼设置咖啡馆、便利店或活动中心，对社区居民开放，使老年人持续参与社区生活，探访家属也能自然融入日常，有效避免了设施与社会的隔离。同时，日本养老设施积极推动代际共生项目，通过建设老幼共融空间，组织儿童与老年人共同参与教育、游戏和文化活动。研究表明，这种跨代互动既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独感，也增强了年轻群体对老龄社会的认知与包容[15]。

6. 规划响应：面向代际团结的养老服务设施空间营造策略

6.1. 从床位供给到关系供给：规划理念转型

“关系供给”是指养老服务设施以促进和维护代际关系为核心目标，通过空间环境、服务内容和组织文化的协同配置，为老年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互动协作和关系维系提供支持的一种规划理念。这一理念回应了空间生产理论关于“空间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又塑造社会关系”的观点，强调养老服务设施不仅是生活照护空间，更是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载体。

在供给逻辑上，应由传统“一人一床”的设施供给转向以“家庭系统”为对象的关系供给，根据不同地区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实施差异化规划。例如，多代共居地区可重点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提供日间照料和喘息服务；人口流出地区可建设兼具专业照护和远程探视功能的小型养老机构；大都市地区则可布局兼具短期照护和家庭探访功能的养老综合体。

同时，应从空间设计、服务内容和组织文化三个层面推进规划转型。通过设置家庭会客区、共享活动空间等代际共享场所，完善家庭参与照护和代际互动机制，营造“欢迎家庭、支持陪伴”的服务理念，使养老服务设施由单纯的照护空间逐步转变为连接家庭、社区与社会的情感联结空间，实现养老服务由“功能供给”向“关系供给”的转型。胡湛和彭希哲也指出，老龄化的治理选择必须从聚焦老年人个体转向关注家庭整体能力设施规划当与此呼应[5]。

6.2. 构建“邀约式”代际共有空间：核心策略与共享体系

规划应消除养老设施的隔离与“送养”污名，将其打造为对代际双方均具吸引力的“共有空间”——通过将养老功能与儿童托管、图书馆、咖啡馆等社区设施混合布局，使养老节点融入日常人流，让子女探望和居民休闲成为自然随心的行为，而非带着愧疚的专门探视。在微观层面，设置半私密的代际协商角与回忆室，为家庭决策和深度交流提供安静环境；布置共用厨房、园艺工坊等亲子协作区，让两代人通过共同劳作重拾联结；预留可供短期留宿的家庭套房，支持“短期共居”体验，以类似家庭旅行的温暖记忆，彻底扭转空间的情感基调，让养老设施真正成为社区活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6.3. 推动数字化时代养老空间创新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在代际分居日益普遍的背景下，许多家庭面临探访频率不足的问题。未来养老设施应积极建设智慧养老平台，通过远程视频探访系统、健康监测平台和家庭互动终端等数字化设施，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同时，可利用智能设备和数字技术丰富养老空间功能。例如建设线上线下融合活动空间，组织远程家庭聚会、跨区域文化活动和虚拟社区互动，突破传统空间限制。数字化养老空间建设不仅能够缓解代际分离带来的情感压力，也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效率和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7.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核心发现是，养老服务设施绝非单纯的物质投入问题，其空间功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已从传统认知中象征家庭断裂的“最终归宿”转变为在相互性孝道、居住分离与消费社会合力下的新型“情感联结站”；因此，任何养老设施规划本质上都是对理想代际关系和晚年生活方式的主动设计，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规划即使床位达标也会制造隔阂，而富有洞察的规划则能培育代际团结。本研究属于理论阐释型探讨，尚缺乏广泛的实地观察数据支撑，未来需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空间行为制图等混合方法进行实证比较研究，并将“代际友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规范标准、土地出让条件和运营评估指标，使之成为刚性原则，从而让老年人与家庭在面对养老设施时，看到的不是暗淡归宿，而是联结的温暖起点。

参考文献

[1] 王萍萍：2025 年全国人口总量为 140489 万人 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EB/OL]. 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2026-01-19.

[2] 王鹏, 罗小龙, 顾宗倪, 陈艳如, 钱爽. 城乡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给均等性研究——以苏州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24, 44(6): 61-69.

[3] 陈锦垚, 宋永永, 李芝墨, 侯聪颖, 王智勇, 郑雅欣, 郎琪童. 基于多源数据的西安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特征与优化决策[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53(5): 84-101+2.

[4] 周燕珉, 冯潇逸. 养老设施室外环境中 4 类重要空间的适老化设计——基于使用者的活动及需求[J]. 风景园林, 2023, 30(9): 65-71.

[5] 胡湛, 彭希哲.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2): 134-155.

[6] Bengtson, V.L. and Roberts, R.E.L. (1991)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 An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856-870. https://doi.org/10.2307/352993

[7] 费孝通.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8] Yeh, K.H. and Bedford, O. (2003)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 215-228. https://doi.org/10.1046/j.1467-839x.2003.00122.x

[9] 蔺煊皓, 胡安宁. 双元孝道中的同胞效应[J]. 人口与经济, 2025(4): 16-30.

[10]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11] 马春华, 石金群, 李银河, 王震宇, 唐灿.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J]. 社会学研究, 2011, 25(2): 182-216+246.

[12] Hochschild, A.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 杨善华, 贺常梅.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1(1): 71-84.

[14] 沈奕斐. 个体家庭 iFamily: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195-223.

[15] 伊藤增辉, 周燕珉, 秦岭. 日本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配置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 35(1): 20-28.